

傳統啟蒙教育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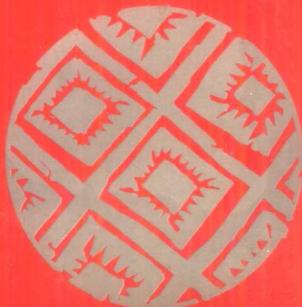
徐梓 王雪梅 編

山西教育出版社



須知 蒙学

童蒙須知 · 童子禮 · 小學曰程 · 白鹿洞書院學規 · 程董二先生學則 · 家塾常儀 · 洞學十戒 · 童蒙訓 · 少儀外傳 · 小學 · 嘉言 · 初學備忘 · 儀小經 · 文式五



131980

6423.3
2840(m)



蒙学须知

徐梓 王雪梅 编

蒙学须知

徐梓 王雪梅 编

*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 11 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字数：220 千字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5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4,500 册

*

ISBN 7-80578-559-7

G·553 定价：3.40 元

出版说明

传统蒙学可以说是传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方面，体现了封建社会的全部伦理价值，但是也确实含有不少合理成份。单从研究、借鉴其教育思想的角度讲，它所采用的朗朗上口的韵语形式（易读易记）、事理并举的方法（典故、故事与说教相辅相成）及其广博的知识内涵（天文地理、花草鱼虫、历代兴衰、古今人物、为人行事、吟诗作文等等不一而足），是值得今人琢磨一番的。当然，这一切又是和诸多的封建伦理说教掺杂在一起的，忠孝节义、君臣父子那一套充乎其间，不予以批判也未免偏颇。不过无论是继承还是批判，无论是借鉴还是参考，没有资料总是不行的。而传统的蒙学资料又浩如烟海，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编一本什么《蒙学大全》。可取的办法是，将有关资料分析归类，然后取其有代表性、历史上影响较大者，类而编之，从而为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各界研究人员提供方便。

本套丛书由四本书组成。《蒙学便读》、《蒙学歌诗》大致为传统蒙学教材；《蒙学须知》则是封建教育对蒙童提出的伦理要求，除学规学则外，也包括了为成人提供的如何训诲儿童的资料；《蒙学要义》收录讲蒙学意义和方法的资料。可以说，以上几方面包容了传统蒙学的全部内容。

各书收录的资料，一般未注明版本。注释则视各篇情况而

稍有详略。除极个别文章因篇幅过大或内容芜杂而采用节选外，其余均全篇采用。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出版本丛书，目的仅仅在于为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特别是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同志们提供一些基本的、典型的资料，以便其研究或批判之用。如果有人用之来教育子女，或者有人认为我们是在鼓吹封建伦理道德，那就有悖我们的本意了。

山西教育出版社编辑部

本書收入文章十三篇，主要講傳統蒙學對蒙童提出的要求，包括學規學則及成人如何對蒙童施行教育等內容，并附「中國傳統蒙學述評」一篇。

(A) 7613

傳統啟蒙教育資料

蒙學便讀

蒙學歌詩

蒙學須知

蒙學要義

傳統啟蒙教育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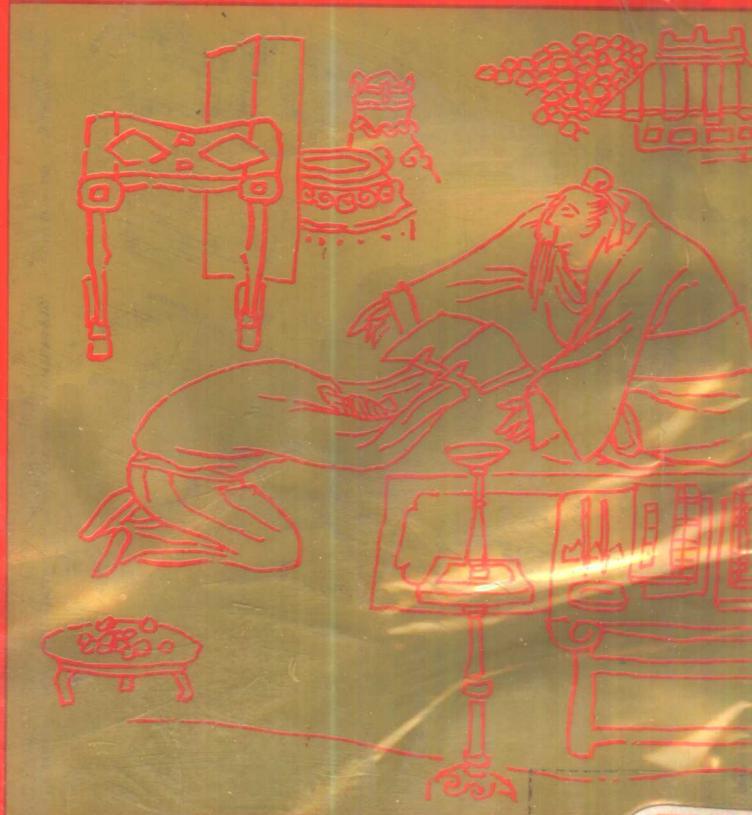


封面設計
責任編輯
春 聲

題字

劉及和

琚林勇



ISBN 7-80578-559-7

G·553 定价：3.40元

目 次

中国传统蒙学述评

徐 梓 (1)

童蒙须知	(南宋) 朱 熹 (20)
童子礼	(明) 屠羲英 (26)
小学日程	(清) 陈 瑶 (36)

白鹿洞书院学规	(南宋) 朱 熹 (41)
程董二先生学则	(南宋) 程端蒙 董 珠 (44)
家塾常仪	(南宋) 真德秀 (50)
洞学十戒	(明) 高贲亨 (56)

童蒙训	(南宋) 吕本中 (59)
少仪外传	(南宋) 吕祖谦 (107)
小学·嘉言	(南宋) 朱 熹 (191)
初学备忘	(清) 张履祥 (218)

仪小径	(清) 李因笃 (249)
塾课发蒙·文式五则	(清) 张行简 (297)
后记	(299)

中国传统蒙学述评

徐 桢

把儒家学说理解为一种教育学说是具有一定道理的，两千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儒者的努力，其目的都可以归结为正己和教人。所有的儒者，首先必须有一番修身的工夫，通过学，即通过所谓的博学慎思、体察涵养、克己内省和存心养性以善其身，树立起教导他人或供他人仿效的榜样，这之后，他才能以自己的德、言、功向全社会传播儒家的理想，通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努力，实现德治或礼教的目的。因此，儒家学说，实质上就是关于教化的学说，它的最终目的在于化民成俗，也就是使人们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自觉地接受儒家的伦理规范并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很显然，儒家的教化并不局限于学校教育的范围，也不一定要由教师或儒者来承担。它通常指整个的社会教育而言，并且，国家的政治措施在这方面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所谓“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善于化。”⁽¹⁾ 学校教育不过是整个社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学校教育只是整个社会教育的集中体现和典型反映。

中国社会的文化特征，表明了儒家教化的成功。榜样的示范、环境的感化、舆论的影响乃至政治力量的制约固然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儒家对儿童阶段教育的极其重视以及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所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显然有着更为根本的作用。

(一)

主要是从教育的目的着眼，在我国历史上，一个人接受教育的过程被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从表面上看，小学和大学的划分更多地考虑的是受教育者的年龄，比如《大戴礼记·保傅》：“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古人二十岁束发而冠，束发而就大学即是指二十岁进大学。又如《尚书大传》也说：“公卿之大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岁入小学，见小节而践小义；年二十入大学，见大节而践大义。”再如《汉书·食货志》在叙述“先王教人之大略”时则说：“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记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更是一种经常化的说法。其实，不论属于小学阶段的教育，抑或是属于大学阶段的教育，年龄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二十岁以上的成人在农闲时节，到私塾或村学中接受启蒙教育的极其普遍。并且，上述小学大学阶段的年龄起迄也不尽一致，而实际情形只能是比这种不一致的说法更不一致，以至于年龄不能用作划分小学和大学的标准。

以教育内容和教育目的为划分小学和大学的标准，才抓住

了问题的本质。宋代学者吕大临说：“小学之教，艺也、行也；大学之教，道也，德也。礼乐射御书数，艺也；孝友睦姻任恤，行也；致知至于修身，德也；所以治天下国家，道也。古之教者，学不躐等，必由小学，然后进于大学。自学者言之，不至于大学所止则不进；自成德者言之，不尽乎小学之事则不成。”⁽²⁾元代学者许衡的说法则兼顾了入学年龄和教育内容这两个要素：“古者民生八岁，上至王公，下至庶人子弟，皆令人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岁，自天子之元子众子，公卿士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在他看来，“先之以小学者，所以立大学之基本，进之于大学者，所以收小学之成功也。”⁽³⁾清初学者陆桴亭也说：“小学之设，是教人由之；大学之教，乃使人知之。”⁽⁴⁾

对小学和大学教育目的、教学内容论述得最充分、最精彩的，还得数朱熹。“古者初年人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⁵⁾“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⁶⁾可以说，小学要学的是形而下的事，大学要教的是形而上的理。朱熹还说：“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不进之于大学，则无以察乎义理，措诸事业，而收小学之功。”⁽⁷⁾“古人小学，养得小儿子诚敬善端发见了，然而大学等事，小儿子不会推将去，所以又入大学教之。”“小学，是学事亲、学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

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⁸⁾这就是说，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是小学的升华。小学教育，限于洒扫应对进退之节，懂得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朋友之交、长幼之序，学会谨守心术之要、成仪之则、衣服之制和饮食之节，而大学阶段，更要把这些礼节的道理考究清楚，在知道了应该怎么做的基础上，进而弄明白为什么应该要这么做。换言之，小学阶段的教育是要学会遵循封建伦理道德，而大学阶段则要把这种道德深化为内在的自觉，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在论述小学和大学的关系时，古人特别强调小学的重要性，童蒙教养成正道，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功业德行。所以如此，就在于小学乃是“作圣之基”。“故学圣人之道，必自小学始，否则虽欲勉焉而进于大学，犹作室而无基也。成亦难矣。”⁽⁹⁾只有以小学的“下学”为基础，才能有大学的“上达”，没有理会后生小儿的学问，而径直“语上”，那就是躐等，就不会有成。小学的过程，是立大本的过程，“大本既立，然后大学功夫循序而进，无往不通。”⁽¹⁰⁾

朱熹所以极为注重蒙学教育，写了那么多的蒙学读物，发表了许多关于蒙学的见解，也正在于他意识到了蒙学有其基础性的意义。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小学教育作基础，一开始就陷入以冥思穷究为特征的大学教育，“百方措置思索”的结果，只能是“反以害心”。只有以良好的小学教育作基础，“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长大之后，才能“通达事物”，“无所不能”。用一个比喻来说，小学教育是要做成圣贤不模，而大学教育只不过是“就上面加些光饰”，“点化出些精彩”。他坚持认为，在自幼既失小学之序的情形下，有必要在

补上了这一课之后，才有继续大学教育的可能。

古人对蒙学教育的重视，除了基于对蒙学基础性意义的认识之外，还显然是由于下列事实。对于有机会受教育的人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无受大学教育的可能，小学阶段，既是他们受教育的开始，也是他们受教育的结束。他们受教育的最终结果，仅仅是要掌握最低限度的或日常生活中最必需的读写能力，而不在于格物穷理之类的更大功能。小学教育因此以其受教育对象的众多，以及大多数受教育者的唯一的机会而更显重要。

实际上，在儿童还没有入学之前，具有与小学相同功能的家庭教育就开始了。所谓“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门入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目。”⁽¹¹⁾十岁才出就外傅入小学。更有甚者，古代还有所谓的胎教，认为妊娠妇女的视立言动，都关乎胎儿的清浊美恶、智愚贤否，因而要“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跨，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邪视，耳不听淫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¹²⁾认为只有这样，生的孩子才会形容端正，才智过人。

(二)

把蒙学教育简单地归结为伦理道德教育，委实狭隘了些。实际上，蒙学教育有着十分广泛的内容，甚至可以说，传统士大夫所必须具备的所有的知识类型，在这里都可以找到，有些蒙学著作采取类书的形式，即近似于百科全书的形式就很好地

说明了这一点。在这里，天文地理、岁时节令、文事科名、饮食服饰、珍宝器用、文具武备、制作技艺、农桑水利、释道鬼神、鸟兽虫鱼等等，无所不有。蒙学浅显的特征，并不表现在它所包容的范围上，而是体现在它表述的程度上。

但是，我们说蒙学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目的是向人们灌输儒家的价值观念，传播道德伦理，却并非言过其实。以此目的编成的大量专门的读本且不论，在许多综合性的教科书中，这方面的内容也占有很大的份量，即就其它专门的读物而论，也是如此。在历史类中，充斥着善恶为治乱之源的观念、蛮夷与华夏之分的观念、僭伪与正统之辨的观念；《百家姓》起着强固人们血亲情感的功能；《千字文》中则诸多“女慕贞洁、男效才良”，“景行维贤，克念作圣”一类的语句；杂字书中，也不乏“尊卑长幼、忤慢谨防”，“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好善恶恶、积德累仁”；就连各类韵对之中，也夹杂有“诗对礼”、“忠对信”、“富浊对清贫”、“道范对儒宗”、“父子对君臣”。凡此种种，足见道德教育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是居主导地位的。

朱熹所辑的《小学》一书，在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元代理学家许衡在给他儿子的信中谆谆告诫说：“《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讲习，望于此有得，他书虽不治，无憾也。我生平长处，在信此数书，汝当继我长处，笃信而好之也。”⁽¹³⁾明代学者薛瑄把放下《小学》、《四书》及宋代理学家的性理之书不读，而读别的书，说成是“恶睹泰山而视丘垤”。施璜则把《小学》看成是万世养正之全书，培养大学之基本者，认为要入《近思录》之门，进而登《四书》之堂，入《五经》之室，就一定要有《小学》作阶梯。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位进士向年过八十的章懋请教治学的

方法，章懋告诉他要从读《小学》开始。进士开始不服气，认为自己小时读过此书，现在已功成名就，不应该再读这部小孩子们才该读的书了。后来回家取读此书、觉得其味无穷，手不释卷。三个月后谒见章懋时，章懋见面就说：“得毋读《小学》来耶？”进士颇觉奇怪，反问章懋是怎么知道的。章懋说：“看汝一动一静，一语一默，与前迥殊，吾固知读《小学》有得也。”进士于是“大钦服而退。”⁽¹⁴⁾元明清三代学者，注释、解说、改编、增益《小学》的著作超过百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小学》在当时的名望之盛，声名之隆。

所以如此，当然与朱熹的声名有关，但更重要还是决定于《小学》的内容。其书凡四卷六类，其中立教、明伦、敬身为全书的纲目。立教强调教育要依循所谓的道，“盖为教而不本于道，则非教也；为学而不本于道，则非学也”。⁽¹⁵⁾明伦讲的是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和朋友之交，敬身则讲的是心术之要、成仪之则、衣服之制和饮食之节。稽古载三代时圣人贤者已行之迹，与外篇之嘉言、善行记汉以来贤者所言之嘉言、所行之善行，其纲目亦各有立教、明伦和敬身三项。然而所有这些，“不外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五伦，五伦不出乎仁义礼智信之性。”薛瑄一针见血地指出：“仁义礼智信五字，括尽《小学》一书。”⁽¹⁶⁾对此，朱熹说得也很明白，他认为“修身大法”，此书叙述完备，《小学》就是他为后生初学所划定的“做人的样子”。《小学》在形式上虽不便童蒙，编辑方法也多有可议之处，但其内容，确乎是传统蒙学教育的一个典型。

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决定了这种教育只能是以传播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儒家要化民成俗，也就要培养一大批既能修

身又能正人的“醇儒”。教育的任务，不在于创新，培养果敢有谋的才智之士，而是为着守成培养忠厚稳重的贤德之人。“世乱则圣哲驰鹜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¹⁷⁾ 在文化社会，驰鹜的“圣哲”往往因破坏常规和秩序而被看作是不受欢迎的急功好利之徒，高枕的庸夫，则由于他们的安分无过而备受赞赏。人才标准以德行为重，才能和智慧只有首先具备德行，才有意义，如果不注重道德实践，诵读虽勤，词章虽工，也会被看作是于自身无益，于国家无补、于圣人之道无似“空文”。

小学阶段对道德教育的特别强调，还在于古人意识到了人在十五岁之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在这时，染于巷则巷，染于黄则黄，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因而以纯正的儒家伦理去教育也就十分必要。这正如程子所谓：“人之幼也，心知未有所主，则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使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者，后虽有谗说摇惑，不能入也。若不为之豫，及乎稍长，意虑偏好生于内，众言辩口铄于外，欲其纯全，不可得也。”⁽¹⁸⁾ 伦理道德教育，这一时期具有先人为主的意义。此后，习与知长，化与心成，人的气质中清明纯粹的成份越来越多，而昏浊渣滓的成份越来越少，就能养成圣贤气象，铸成圣贤的坯模。

传统蒙学中，所要对儿童进行的道德伦理教育，具体来说，有如下几项。

首先，儿童从就学开始，就被要求树立远大的志向，“幼学之士，先要分别人品之上下，何者是圣贤所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为之事，向善背恶，去彼取此，此幼学所当先也”。⁽¹⁹⁾ 志向的高远与否，被看作是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只有志向远大，辞令容止，洒扫应对才能表现得“百事自当”。所谓远大的志